

爱因斯坦说：“知识是重要的，想像力更为重要，想像力使我们可以拥抱整个世界。”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教育要拥抱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要拥抱某几个名牌大学，从而拥抱“银子”和“官帽”，正所谓“做大官、挣大钱、娶美女”，这不是一条猥琐渺小、悲哀致极并且会扭曲孩子们人格和心灵的不归路吗？

## 孩子的身心记录

10岁出头的孩子也会有心理问题？在上海市第五次少代会上，这个一直被家长忽视的领域，有不少孩子自己提出来了。在少代会的提案中，这方面的提案占了27.6%，是各类提案中最多的一类。

复兴东路第三小学的宛晓晴同学说：“在我就学的年级里就有几个心理存在问题的同学，老师往往在上课时既要讲课还要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影响了其他同学的正常上课。不良的心理环境严重制约同学们智力和人格的发展。因此希望建立‘心灵驿站，让同学们接受健康的心理辅导。”

长宁区14岁的初二学生说：“学生减压，最需要减的是家长、老师所给予的精神压力。”

孩子们呼吁“心灵驿站”和“快乐门诊”。想想我们社会的压力，想想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进出考场所走过的路，看看大学毕业时学生们面临的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我们怎么能不感叹，我们的孩子心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没有被压垮！

2004年北京市小学应届毕业生数量为9万8千人，据调查大约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不甘心摇号的命运，而一定要让孩子上“名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质的硬件环境的“名校”总共的招生名额不过1万人，就是说五万名小学生要争1万个“名校”的名额，如此惨烈的竞争，带给孩子们的会是什么压力可想而知。

尽管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已经被取消，教育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各初级中学通过考试的手段来选拔学生，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名校”拥有了更多的招生自主权，比如增加学校自己组织的面试或者测试等等，而且在报名时要求学生出示成绩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红领巾奖章、各类竞赛所获奖项证明、特长等级证书等，才可能有面试资格，孩子们不能不承受巨大的心理挑战。

一项由1100名中小學生参与的调查显示，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期望，在孩子们眼中成为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

对“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这个问题，45%的孩子回答：“父母的期望。”其次是“老师的期望”、“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望，通过家庭作业的布置可见一斑。据了解，过半数的上海小学生有父母布置的家庭作业。同一项调查显示，小学生的回家作业有70%是父母布置的，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平均每天用45分钟完成父母布置的作业。其实这种状况在中国大陆的家庭里普遍存在，城市比农村更为突出。

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压力下，对孩子们的心身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初二的女生，谁也没想到，这位才刚刚 15 岁的女孩子竟患上了甲亢。内分泌科的戴主任说：甲亢本来是一种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小孩子压力太大，中小學生患甲亢的病例已经越来越多了，中小学女生患甲亢的比例尤其高。

采访的记者看到，这位患甲亢的女生长得非常瘦弱，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憔悴，但眼睛很大，而且明显向外凸出。戴主任介绍说，这个女孩学习成绩很好，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这样一来，她的心理压力就比同龄人大多了。因为要处处比别人强，这个女孩子十分用功，用脑用眼过度疲劳。时间久了，心境紧张刺激甲状腺过多分泌，内分泌失调，就导致了甲亢。如今，由于学生的学习压力过大，像这样的中小學生甲亢的患者已经越来越多，这种患者迅速低龄化的趋势，让内分泌专家都觉得吃惊。专家特别强调，从收治的病人情况看，患甲亢的小女孩特别多，学习压力大、用脑用眼过度、睡眠严重不足是导致病情的最主要的原因。

据调查显示，我国患有近视的人数有 3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3.6%，其中病理性近视约 2000 万人。学生近视眼发病率明显上升，接近 60%，居世界第二位，人数居世界之首。其中，中小學生近视率已达 34.6%，高中生达 70%，大学生达 76%。；患者人数超过 6 千万，因近视致盲达 30 万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就业，并对其生理、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妨碍。

专家研究表明，对于占学生近视眼绝大多数的单纯性近视眼患者来讲，环境因素起主要作用，即便是少数病理性近视眼，环境因素亦起重要作用。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老师与学生承受着严重的升学压力。课业负担过重，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是学生近视眼的主要原因。应试教育体制造成我国成为近视眼的高发区。

专家还表示，儿童 6 岁左右视力可达到成年人水平，14 岁以前控制近视较易收效。近年来，近距离工作的增多使许多近视眼的稳定年龄延迟。因此，近视眼防制工作至少应持续至整个求学阶段。

家长不难发现，当孩子升入中学以后，繁重的学习任务使孩子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最近美国科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不但会影响孩子的自信心，而且还会使孩子出现忧郁情绪。

研究人员对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就读的 2259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对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以及忧郁症状和自信心的分析发现，与睡眠时间较多的学生相比，睡眠时间少的学生自信心低下，容易产生忧郁情绪，学习成绩也欠佳。研究结果还显示，中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睡眠时间是一年比一年少。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许多学生的注意力开始下降，学习成绩下滑，自信心缺失，还常常提不起精神。

专家呼吁：若不能有效地控制近视眼，将严重影响下一代的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到民族素质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为了孩子的将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眼，救救孩子的眼睛。

问题是怎么能救救孩子的眼睛？一个孩子从走进小学开始，用眼和用脑的噩梦就伴随着他而行。从早上 8 点到中午 12 点，除课间有几分钟休息，下午 2 点又开始用眼用脑，到夜里十一二点孩子还伏在灯光下做作业。想想吧，那一双幼小的眼睛

带着疲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论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雨，总在白纸黑字间搜寻，而这时我们的大人正在惬意地嗑着瓜子、喝着啤酒、看着电视或者在打麻将、在休闲娱乐，孩子的眼睛怎么可能有救？

我们的心可真够狠的！我们要的是考试的高分、要的是名牌大学、要的是用孩子的成功来抚慰我们做家长的失败的心，把自己不能实现的梦想强加给孩子，让他们来代我们完成。我们以牺牲孩子的心灵、孩子的身体来换取自己的满足和宽慰，当然，这一切都是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承认我们自私，相反我们是以天下最负责的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出现的。如果有谁的孩子在“现代科举”中考得出人头地了，我们就竞相群起而效法；有谁的孩子在“现代科举”中落地了，我们就暗地里窃喜，视其为瘟疫，要自己的孩子躲得远远的。想想吧，我们干的都是什么事？我们所作所为有什么亲情可言？

如此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校园里走出的都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体不得这样病就得那样病的博士、硕士；我们的部队的指战员都戴着眼镜一边吃药一边保家卫国；我们的工人都戴着眼镜生产，我们的农民都戴着眼镜种地，我们的公务员都戴着眼镜办公，我们的学者都戴着眼镜做学问，那时我们就很自豪了，你看，我们终于成了世界上最有知识的民族！我们不可或缺的厚厚的眼镜就是有知识的证明。这下子我们自豪极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睛就证明我们的素质比别人高多少！诸君想想吧，难道我们又想回到“东亚病夫”的噩梦中去？

这就是我们自以为得计的应试教育带给人的远景，这就是我们引以自豪的“现代科举”带给人的蓝图，我们怎能不忧虑？

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青少年创造能力培养现状社会调查和对策研究”分课题——《科学探究学习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调查中，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调查显示，在“敢于对别人的结论提出质疑”的认同中，小学生达到73.1%，初中生76.3%、高中生则降为66.8%。“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这条古训指出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怀疑精神。可是我们的教育正在扼杀人的创造力，孩子们年龄越小质疑性越强，到了高中，面临高考升学压力，学生参与科学探究状况变得不乐观，质疑能力也开始衰减。

调查者发现，青少年已从只会提出单纯记忆性的问题，转而进步为可以提出对两种事物进行比较的问题，但仍不善于发现需要探究才能得到实证的科学问题。这表明，目前的课程教学还明显存在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痕迹，学生的思维方式处于低级阶段，不能捕捉与事物本质有关的问题。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少年提出和发现不同类型问题状况有相当大的差异，小学生明显比中学生善于发现需要通过探究才能得到实证的科学问题。尽管小学生知识积累少，但受思维定势的影响也小，因而小学生比中学生更敢想。这是教育的失败。

该项调查还发现，学生们普遍缺乏克服困难的自信心。在涉及兴趣、自信心、意志力等人格因素时，只有48.2%的被调查者表示“能够克服困难完成”要做的事。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求学之道。可是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超过半数的青少年缺乏克服困难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青少年克服困难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在下降。这说明

我们的教育越往高处走，对人格的培养越没有积极作用。

就是进行这项调查，半数以上学生都表示时间得不到保证。只有 45.6% 的学生在做探究性课题时能有时间保证。调查者认为，是学校考试、升学的压力和家长的教育观念，导致青少年业余时间挤满了应付考试的作业，无暇参与探究性课题。

科学探究需要人文精神，而我们的教育最缺的就是人文精神。爱因斯坦说：“知识是重要的，想像力更为重要，想像力使我们可以拥抱整个世界。”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教育要拥抱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要拥抱某几个名牌大学，从而拥抱“银子”和“官帽”，正所谓“做大官、挣大钱、娶美女”，这不是一条猥琐渺小、悲哀致极并且会扭曲孩子们人格和心灵的不归路吗？

下面是一篇来自新闻媒介的报道：

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来了一群金发碧眼的洋学生，他们来自英国亚顿学校，这是两所学校学生间的第二次互访。

这次访问，给英国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学生功课太多，朋友太少。

来访的英国 10 年级学生 Estelle 周末是在中国同学朱晟怡家度过的。她感到奇怪的是：才念初一的朱晟怡怎么有这么多的作业要做？竟然要做到晚上 11 点半！害得 Estelle 只好看杂志、吃巧克力打发时间。

Estelle 说，在英国，学生可以自己安排做功课的时间。学校的作业，也不是今天布置，第二天就得完成，往往是写论文或做项目的形式。这位英国学生说：“有时候，我一天只要做 5 分钟的功课。”

同样中国学生惊讶的是：英国学生朋友真多。

听说英国学生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不少中国学生流露出羡慕的眼神。让英国学生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学生的朋友少得可怜。

来访的英国学生坦言，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包括异性朋友。家长支持孩子参加社交活动，认为这样孩子将来才能融入社会。英国学生说：“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跳舞、唱歌、喝咖啡、骑马、看电影、滑雪……这些都是英国年轻人热衷的活动。”

中国学生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被学习占满了。因为中国伙伴大家都太“忙”，没有时间来陪人玩乐。这次来访的不少英国学生只好在 MSN 上找英国的朋友聊天。

对于英国学生来家做客，不少中国学生的家长都格外重视。不仅亲自出面全程陪同游玩，而且总爱带英国学生下馆子，以示热情。而英国学生倒有点不适应这样的“热情”。

去年曾去英国访问的初二学生袁泉告诉记者，在英国家长几乎很少插手孩子的事情，即使出门，也是由英国学生找一些朋友陪他们出去参观，尽地主之谊。“有时玩到凌晨回家，英国的家长也不会过问去哪里、干什么了，只要提前告诉父母几点回家就行了。”

这次给英国学生上书法、篆刻课的老师，都不约而同地说，英国学生不怎么“听话”。

比如上篆刻课的时候，老师还没把握刀的要点和注意事项讲完，英国学生已经自己动手在印石上划了起来，而中国学生总是习惯于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英国学生不同，他们练完直线后，直接就刻起了自己想刻的中国字，自主意识很强。而

且，英国学生一旦学会一项技能，他们马上会利用这个技能来创新，而中国学生则显得缩手缩脚。

看看这篇报道，我们可以感到，我们的教育似乎缺乏的正是人性中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自由和自主意识。有了自由和自主，人才能创造，创造性是从自由和自主激发出来的。因为没有自由和自主，我们也不懂得人权的价值，也就不会尊重他人并且被他人尊重。我们更注重的是功利而不是人性，所以我们缺少“以人为本”的精神。一个没有尊重人权和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怎么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呢？又怎么能使我们的孩子健康、幸福、轻松并且快乐地生活呢？

中国儿童中心公布的一项关于中国少年儿童素质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53.47%的父母把对孩子前途的期望押在“将来上大学”的选择上；其次是“只要孩子将来生活幸福”，最后才是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这不是一种应试教育束缚下本末倒置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呢？我们真该好好想一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是做个生动活泼的人重要呢，还是做所谓的考出个高分的“人才”重要？

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目标是“将来上大学”，因为这个要把考试分数放在第一位。对于“只要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其它的什么都不重要”的观点，11%的家长完全赞同，大部分家长总体倾向于同意，只有27%的家长持不同看法。对“孩子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情绪比学习还重要”这一观点，完全同意的家长只有5%，32%的家长竟完全反对。

重分数，轻能力；重竞争，轻合作，也是调查中显现出来的问题。调查表明，家长普遍倾向于“相对于孩子自己探索问题的能力，更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否定这一观点的家长只占11%。从调查结果来看，家长并不重视培养孩子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生活的能力，而且普遍认为“竞争能力比合作能力更重要”。

这就是我们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差别，在那些国家里，更重视对人的尊重和与人的合作。

在“担心减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一项上，认为减负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家长只占17%。而大多数家长普遍担心不提倡追求高分和不排名次会降低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

应试教育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这些年造成了多么根深蒂固的偏见。“现代科举”之所以有市场，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更可怕的还在于千百万人的僵化观念。在这样的观念和社会中，我们的孩子就不得不吃苦受罪了，而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北京晚报》登出一位叫小婧的考生自白：“高三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是一个即将高考的考生，在学业这方面也可以算是“过来人”了。今天我就以我自己的经历，对各位家长说说我们的脾气为什么随着年龄猛涨。其实我们的脾气暴涨是由压力造成的，学校的压力和家庭的压力。

大多数经历过高考的人都会说同一句话：这高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其实每个阶段的学习都是如此，只是初三、高三更甚。

我发现，放假时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睡觉，不用白天黑夜地学，我很少发脾气，

可是一开学就不一样了，像上了弦的机器，甚至保证不了每天6小时的睡眠。每位家长应该都知道睡不好就容易心烦意乱吧。说心里话，我知道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也知道父母心疼我们。每天我熬夜，老爸陪着我，我几点睡老爸就几点睡；我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老妈心疼我就问我吃不吃东西，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心里很感动，但说出口的话，不知为啥就“横”过来了，而且极不耐烦。听着妈妈叹息着又回到床上，却辗转难眠，我心里特不是滋味，好多时候都因为后悔伤了妈妈的心哭得眼睛生疼，每当这些时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在学校我们面对老师的谆谆教诲，本想到了家清净清净，可到了家还要听父母“唠叨”，不能对老师发脾气，就只能“欺负欺负”爹娘了。现在每次考试都是一场恶战。有一次模拟考试，我刚到家书包还没放下，妈妈就问考得怎么样，我就感到非常反感，不光是我，每一个考生最不愿听的就是这句话，我那句“烦不烦”的第一个字已经出来一半了，又费尽吃奶的力气把它咽了回去，拎着书包回屋了。

我很高兴父母可以把我当成大人看待，有时对我说些家里事。但他们忘了我毕竟只是一个17岁的大孩子，我心中装不了太多的东西，比如父母的矛盾，感情的危机。每当我看到他们有摩擦，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费心思，这无形中会影响到我的学习和心情。

在巨大的压力下面，孩子们控制不住情绪，需要发泄。有时可能对父母发泄，有时可能对自己发泄，有的时候也可能走极端，对社会发泄，无论什么样的发泄都可能会给人的心理给社会造成伤害，而我们的教育和“现代科举”是始作俑者，我们不得不承担痛苦的代价并且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高考落榜，汉中市汉台区一考生杨某竟在互联网上扬言要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和图书馆搞“自杀性爆炸”。“恐怖信息”惊动了公安部，陕西北京两地警方联手，将杨某抓获。据查，杨某2001年高考落榜，以后复读高考连续落榜，情绪一直很低落，当他在一网吧打开清华大学的网站浏览有关录取信息时，心理失衡发出“要在清华大学搞自杀性爆炸”的恐怖帖子。

这也是一种宣泄，是心理难于承受巨大压力的爆发。问题不在学生这样的危险性倾向，而在于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总是给学生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总是不能让孩子们快乐的学习呢？

一个来自四川成都的汉子，整天头顶烈日奔波在包头大街小巷。手中的照片成了他可怜的精神寄托。白天，他拿着照片四处打听，夜晚，他捧着照片，摩挲着照片上女孩的笑脸，老泪纵横。漫无目的寻找带给他的全是失望，心力交瘁之下，他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内蒙古晨报》求救。

“你们能帮我找找女儿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可是我的命根子呀！”

这名汉子操着一口四川话，满脸是泪，神色凄然地讲述了事情原委。

原来他叫李保国，女儿叫李涵，19岁。李涵的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李保国心情不好，便骂了女儿几句。当时骂完也没多在意，晚上回家没见到女儿，同时发现女儿的毕业证、身份证、衣服都不见了。李保国忙给李涵的同学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没见到李涵。查看女儿放在家中的小灵通，发现上面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拨过去才知是成都火车站的电话。李保国说，当时他就蒙了。女儿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在这个世界上女儿也就只有他一个亲人。

在成都铁路公安局，李保国查出女儿乘坐的是当天8：50从成都直达南京的火

车。当时还有一名售票员看见李涵买票时泪流满面，由于只剩下短途票，李涵买了从成都到绵阳的车票。因为李涵行为举止特殊，曾引起铁路有关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们便根据其在健康登记卡上填写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但无人接听。李保国后来又打听到，女儿在绵阳又补票到西安，从此便没了消息。

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个人，仿佛大海捞针一般，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发现女儿留在家中的小灵通上有一个内蒙古包头的电话号码，这又给了他一线希望。于是，他立即乘飞机赶到包头，通过包头市白彦道派出所找到了电话所在位置，可那只是一个公用电话亭。李保国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住在包头，每天出去寻找打听，一个多星期了，仍没有一点线索，女儿现在到底在哪儿？

这样的事件让人很难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作为家长，我们为什么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总是要亲手酿苦酒，逼着孩子和自己喝下去呢？我们做了应试教育的帮凶，我们自己是“现代科举”的受害者，我们没有醒悟，还把孩子往火坑里推。这就像封建时代的女人，自己裹了小脚，受尽痛苦和凌辱，还引以为美、为骄傲，逼着女儿再往下裹，就这样一代一代把毫无人性的东西传下去。而且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还被我们越传越精彩，成了我们的“国粹”！

宝鸡市经二路河滨公园人造湖，有人发现一个高考落榜的小伙脱光了衣服躺在公园，后来又在公园里乱跑，嘴里一直叨叨个不停，后来竟跳进湖里。湖水不深，水面上装着彩灯，水下接着电线，小伙在湖里乱拔电线，一旦电线短路将会出危险。经二路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与公园保卫科的人一起将裸体小伙救上岸。群众说，这名小伙是因高考落榜精神错乱了。

记者问小伙多大了，小伙说自己是1983年生的。记者问他家在哪儿？小伙糊涂了，谈的是化学、时政，不时冒出一串数字，说“你上网查去”。

记者问小伙：“考上大学没有？”

小伙瞅着记者说：“他们不要我。”

这又是一个高考的牺牲品。“现代科举”正在兵不血刃地残杀我们的孩子，摧惨孩子的心灵和身体。每一年高考都要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逼着孩子上战场的人，自己也过得提心吊胆。

潼南的尹万军自小聪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95年高考，以2分之差落榜。得知成绩的那天，他从学校木然回家，面对母亲的询问，只是反复的喃喃自语：“失望了！失望了！”此后，患了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好多天，从此精神失常。

因落榜受到打击患上严重的精神病，8年间这个高考制造的精神病患者先后刀刳8岁的外甥女、重伤邻居的小孩，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惨剧。

2003年这个高考落榜的精神病人把母亲溺死在水缸中，又被“逮捕归案”。

如果说高考制造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中考就更伤害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了。读完初中就因为考试而不能继续读书，那是孩子心理所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现在未成年人犯罪触目惊心？这与我们的教育，与我们的中考让很多孩子流落街头，让孩子们从一读初中就被“我还能不能考上高中”这样的心理压力煎熬是分不开的。我们没有勇气承认的是，正是我们的考试制度，把生动活泼的孩子变成为考试活着的机器，当这个机器一旦失去考试的资格，他留在学校里还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中考、我们高考的奥妙！

也正是这样，对社会和对人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7岁的河北少女小乔坐上民警为她安排的专车，踏上了回乡路。这个因中考落榜离家出走、被北京朝外派出所收留9天多的沧州姑娘临走时还是觉得没脸回去见3个已经考上高中的好朋友，没脸回去见“哪怕我拾破烂也要供你上大学”的妈妈。

小乔去年中考落榜后，心里非常痛苦，第一次离家出走，被天津收容站收留了好几个月。此后，小乔听说北京的大学可以旁听，今年7月7日，小乔拿了家里的100多元钱，再次离家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当天下午4点多，小乔到了北京，在一家小旅馆住下。7月8日，小乔出来打听北京的大学在哪里，路上碰了几次钉子后，蹲在建国门桥上哭了半天。中午过后，小乔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看她说不出自己去哪里，就把她送到了朝外派出所。民警们收留了这个流浪的小姑娘，9天里民警不断给她做思想工作，动员她回家。但小乔的神情一直很沮丧。

和小乔一样，哈尔滨16岁的佳范中考失利后，不能进高中读书，怕家长批评，就在中考后的一天离家出走。她到了本溪，住进一个网友的家。伤心的佳范给哈尔滨的姐夫打电话说：“我是佳范，我要走了，活着没意思，我要去死，你们不用找我了！”

焦急的父母经过查询，佳范的电话是从本溪打来的，只好赶到本溪找派出所报案，经过民警帮助才找回这个小女孩。

还有更不幸的。

仙桃三中初三（13）班学生小雪服老鼠药死在家中。遗书上说，她自杀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

小雪的死让很多人感到意外。20日上午上第二课时，小雪对同学说她已向老师请假，并将钥匙和一些学习用品交由同学保管。当晚，小雪被发现死在床上。据小雪的老师介绍，小雪在上小学时，一直是尖子，上中学后成绩仍处在上游。初二时，她曾有过自杀的想法，她父亲还从书包里搜出过老鼠药。

让人叹息的是，小雪的父亲本身就是一名教师，平常也没少劝导女儿。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给孩子带来的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压力是多么可怕，以致于让花季年华的孩子竟因为承受不起痛苦而放弃生命。

更有承受不起压力，要走极端的。

贵州安龙县洒雨中学初三学生李某中考落榜，竟身背炸药要找老师报仇，让老师赔偿自己10多年读书的一切费用。

警方抓获李某时，他背着已装好引爆装置的4个炸药包和1把菜刀。所幸这场惨剧被制止在萌芽中了。但是重要的不是制止一场惨剧，而是要找出之所以会酿造惨剧的根源，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面对下面这个惨剧的发生，作为一名当事者的校长的辩解，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校长尚且如此把“现代科举”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孩子们的悲哀就可想而知了。它也说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是多么地需要补补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课。

湖北省枣阳市兴隆二中初一（8）班班主任孙延波把全班学生第二次月考成绩排名表发给学生。学生杨思勤接过成绩表，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倒数第三名的位置，便将名次表揉成一团。孙延波发现后，心中不悦，要求杨思勤把表展开、铺平。杨迟迟不肯。孙便令杨思勤“站起来！”杨站起来，孙仍坚持要她把表展开。此时，性格内向、脾气倔强的杨思勤边哭边把名次表撕成碎片。孙延波见状说道：“不要把功

夫用在发脾气上，要用就用在在学习上！”说着，将杨思勤袖子一扯，令其站在教室外面。

当晚 5 时 30 分左右，杨思勤给她的爸爸杨华建、妈妈张道华留下这样一份遗书：“亲爱的妈妈爸爸，我对不起您们。妈妈辛辛苦苦为我做饭送菜，把好的留给我吃，自己尽吃坏的。我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习，考试考了一点儿分，我实在没脸见您们了。再见，再见……您们的女儿。”写完告别亲人的话，年仅 14 岁的杨思勤从宿舍五楼纵身跳下，自杀身亡。

兴隆二中校长王义贵接受采访时称，杨思勤跳楼自杀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成绩不佳，自感愧对父母，而非老师的“过激行为”所致。“孙延波对杨思勤实施的行为，属于善意的教育管理方式，”王义贵说，“好多家长送孩子到学校时，都讲这样的话——孩子不听话，老师尽管打。杨思勤的父母难道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当年交白卷的张铁生？”

孙延波老师说：“排名次是为了让学生知道自己差在哪里。”在兴隆镇有两所中学，竞争很激烈。“在校内，学生的考分也与教师的上下岗联系在一起。”

孙老师的话泄露了“天机”，学生的考分是与教师的上下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可见“现代科举”为什么深入人心了。

兴隆二中校长的辩解听起来同样挺对家长们的心，挺鼓励竞争的。面对“现代科举”哪个家长敢让孩子交白卷？交白卷就意味着不能“做大官、赚大钱、娶美女”，谁敢冒这个险！所以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时，我也是对老师说：“孩子不听话，你尽管打！”因为我要的是你把孩子培养成能在“现代科举”中出人头地的“人才”，可是你把孩子“打死”了，我还有什么希望？这位校长没明白的是，你怎么和我一样傻？竟把我的话当真！

广东省化州市，发生了一幕四名初中女生相约集体自杀的惨剧，更令人不得不深思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我们怎么能对一个个花季年华的孩子竟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这个事实而无动于衷？

这四个相约集体自杀的女生都在化州某中学读初三，她们不属于老师常说的“问题学生”。四个女孩子自杀的原因是，她们当中的两位在一年前曾遭歹徒强暴，担心在中考体检时被查出不是处女，另外两位则甘愿陪着伙伴一道死。

3 月 5 日凌晨 1 时许，广东省化州市四名初三女学生集体吞服了 500 片安眠药。3 月 6 日中午发现这四个女孩子自杀的事件，孩子被送进化州市人民医院抢救。据化州医院内二科主任殷汉贤介绍，四名女中学生平均每人吞服了 125 片安眠药。医生说服用如此巨量的安眠药是他多年从医经历中首次见到。

据自杀的女孩子阿菘说，学校传出要中考体检的消息，听别人说，体检要脱光衣服，可以查出是不是处女。阿菘赶紧和阿晓及知道她们被强暴的女生阿香、阿玉商量。

阿菘说，活着这么痛苦，不如死了算了。阿香和阿玉则说，她俩成绩差，中考恐怕连四中都考不上，干脆陪着一起死。就这样，四名少女达成了集体自杀的意向。

在河滩上，四个少女一边吃东西，一边唱歌，一边说笑，谈着“下一辈子”的事。凌晨 1 时左右，东西差不多吃完了，阿香点上一支蜡烛，说“我们该吃安眠药了”。这个情景多么凄凉，多么让人不敢相信——放弃豆蔻年华，却要幻想“下一辈子的事”，

这是何等悲哀，是对现实社会何等的嘲讽！

四个女孩子的生命被抢救过来了。可是到记者采访时，她们中的一个已经离开自己学习的学校，离开生活过的城市，躲到别处去。另外两个拒绝采访，什么也不说。剩下的一个认为自己“死都死过了一回”，把真相告诉记者。不容置疑的是她们的心理都将留下深深的创伤，而这将影响她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

不说孩子们是不是愚昧，仅就一项中考前的体检是什么内容，孩子们都是“听别人说”，可以看出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校教育做得怎么样？竟没有想到给孩子们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难道仅仅是个“体检”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吗？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陪着自杀的两个女孩子是担心中考读不上高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还在发育的年龄，却要操心自己能不能升学继续读书，这是何等的压力？这样的教育能让孩子们感到有希望不？这样的社会能让孩子们感到温暖不？我们敢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的话，孩子已经用他们的生命和血泪来做出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警醒？

如果说孩子愚昧，那也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就青少年“性的知识”给了我们的孩子什么帮助？我们把科学和正确的道德伦理观传授给孩子们了吗？我们让孩子了解他们生理变化的每一个过程，恰当地知道这是为什么并且知道怎样来对待了吗？如果我们“疏忽”了，那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并且纠正。难道不是这样吗？

中小學生深深为自我接纳压力焦虑，常常“希望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失望”，这是一项调查所揭示出来的。中小學生强烈的学业竞争压力、普遍的自我评价过低和退避反应，集中体现了社会激烈竞争的影响。据报道，1998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1100万至1300万人，真实失业率在6%到7%之间，创建国近50年来的最高记录，实际失业人口相当于1980年的两倍。与此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剧。与1997年相比，只有4.08%的中國人在銀行中的存款增加了許多，沒有增加甚至減少了的占65.57%。

不难想象，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加上中国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应试教育难以遏止的惯性，中小學生面临的学业竞争压力会有多大，他们稚嫩的心理如何能在这种几近残酷的竞争、反反复复的学业失败中始终保持平衡？改革现有的中小学教育评估体制，确实是刻不容缓了。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有完善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

现代医学认为躯体和心理两者是一个统一体，即密切相关，又相互影响。精神上的健康必须以身体的健康为基础，而心理健康又可作用于身体健康，同时还可促进智能的正常发育。

社会生活的完好也是衡量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主要反映在孩子是否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人际交往的能力和自理能力等方面。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只有具备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良好的情绪和自主能力的孩子才称得上是健康者。

面对高考、中考，总有不少孩子倾诉觉得生活压力太大。为什么孩子的心理如此脆弱？

中山大学教科院的教育专家郑永庭教授呼吁：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生命价值观的

教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要再让悲剧发生。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和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提醒考生父母：要注意对考生考后关爱，不要让孩子觉得只有考好了自己才有价值。其实，这不仅是个关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应该改革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怎么让孩子感到自己不被抛弃，感到有出路的问题。要让孩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就要给孩子活得快乐，活得公平的机会，我们这个社会给予孩子这种保障了没有？

面对一个又一个“现代科举”的无辜牺牲品，我们的心怎能平静？我们的社会又怎能安宁？我们这个有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又怎能“礼仪”得起来？我们为什么就看不见应试教育、“现代科举”留给我们的潜在威胁？我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为“现代科举”喝彩，好象除了“现代科举”可以选拔“人才”，拯救中国外，我们就真的别无办法可想了？

我痛心的是直到现在，中国大陆还在全民一致为“现代科举”的完善出谋划策，深怕对学生管的不严，深怕对考场戒备的不森，深怕对孩子处罚的不狠！整人怕留给你个喘息的机会，“现代科举”就是这样一条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学校也把整学生的“稳准狠”当成大事来抓，从老师到校长，没有一个对孩子有点儿同情心的，我们要求孩子好得不能再好，完美得不能再完美，而这些好和美都是以服从我们的意志为衡量标准的。我们忘记了“孩子毕竟是孩子”！

我们的固执己见使我们看不见做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因此我们从来不去想一想改革旧的体制和东西，反过来却拼命地去维持旧秩序，只要有谁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就百倍疯狂千倍仇恨地加以扼杀。有人上访了，我们压制；有人批评了，我们打他一棒子；有人考场作弊了，我们把惩罚定得越来越重，作弊一科就废掉你的所有科。我们相信“严刑峻法”能够镇压一切。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当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种行为要靠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才能维持时，这种被维持的东西本身是不是就出了毛病？周厉王时就出现“道路以目”，我们不该把事情弄到“道路以目”才来解决，要知道那是很危险的。